中国传统社会救助伦理思想的基本内涵及现代启示

邹海贵, 曾长秋①
(南华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 中国传统的社会救助有悠久历史, 整体上是一种"伦理救助"模式。儒家以性善论为主流的人性思想和以忧患意识为核心的道德心理, 构成了传统社会救助的伦理道德基础。儒家以"仁"、"德"为核心的人道主义思想, "以民为本"的政治伦理思想, "均平"的差等分配伦理思想, 构成传统社会救助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道家"无为"的政治伦理和"贵生"的生命伦理思想, 以及佛教的慈悲精神, 构成传统社会救助伦理思想的重要补充。传统社会救助伦理思想是构建我国现代社会救助制度, 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宝贵思想资源。

[关键词] 社会救助;　伦理思想;　现代启示
[中图分类号] B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0)04-0021-06

古往今来, 人类的生存、发展始终与贫困、灾难、风险和不平等相伴随, 人类也一直通过集体的拯救、支援与帮助与之抗争。救助活动关系着人的生存和人类的福址, 显示着人的尊严和人性的光辉, 是人类道德生活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人类文明的重要体现。现代社会, 救助主要表现为社会救助(social assistance), 是一种政府公共行为, 是一种蕴涵人道和正义的社会制度设计。社会救助通过维护弱势群体利益, 具有消除贫困和缩小社会不平等的双重功能, 对促进社会安全、稳定与和谐发挥重要作用。社会救助作为一种经济社会制度, 是社会保障的原初形态, 与时代社会生产方式和思想道德文化有着紧密关系, 经历了传统社会救助和现代社会救助两种基本形态。我国古代社会有着悠久的社会救助传统, 作为社会救助价值依据的救助伦理思想也源远流长, 内容丰富, 并具有明显特色和独特魅力。挖掘传统社会的救助伦理思想资源, 对健全现代社会救助制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　我国传统社会救助简况

中国传统社会救助可分为古代社会救助和近代社会救助两个阶段。与西方相比, 中国古代的社会救助事业出现较早, 且政府介入程度深, 较早地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的道路。早在三千多年以前的奴隶社会, 中国就开始出现社会救助制度的萌芽。商朝建立以后, 总结夏朝灭亡的历史教训, 采取了一些惠民、保民政策。同时, 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 自然灾害频繁, 形成了天命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巫术救助, 带有相当的迷信色彩, 成为相当长时间内政府保障社会成员生存的主要措施[1]。先秦时期, 初步形成了以儒家"仁"、"德"为伦理道德基础的社会救助体系, 汉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并逐渐制度化, 到唐宋时期达到顶峰, 明清时期具有新的特色, 清末和民国时期开始近代转型。中国传统社会救助主要包括政府主导的救助和民间救助两种形式, 内容主要包括灾害救助、鳏寡孤独人伦弱势群体救助、老人救助、贫困救助等。简而言之, 传统社会救助的主要内容即灾害救助和贫困救助, 或曰"救灾与济贫"。我国传统社会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 政府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处于支配地位。在社会救助事业方面, 政府具有同样的地位, 尤其在灾害救助中, 政府的赈灾活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除政府的救助以外, 由民间社会组织实施的救助在日常贫困救助活动中占有重要作用, 宗族组织、地方精英、宗教组织等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救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我国传统社会救助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结构

在我国传统社会救助的发展过程中, 产生和积累了丰富的社会救助伦理思想。从整体上来看, 我国传统社会救助是一种"伦理救助"模式, 社会救助伦理思想以儒家社会救助伦理思想为主体, 以道家、佛教社会救助伦理思想为补充。本文立足于宏观层面, 拟从儒家传统社会救助的人性基础、道德心理、政治伦理、经济伦理, 道家"无为"的政治伦理和"贵生"的生命伦理, 以及佛教以"慈悲"为核心的宗教伦理等方面进行论述。

(一)儒家社会救助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

1. 性善论——传统社会救助制度的人性基础和道德本

[收稿日期] 2010-05-2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课题"社会救助伦理思想研究"项目资助(编号: 08JC720007)
[作者简介] 邹海贵(1970-), 湖南新化人, 南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体

儒家性善论的主流人性设计,构成了传统社会救助的道德基础。儒家集中关注的是人的道德本质而非理性本质,人性善是儒家对人性的基本价值判断。孔子对人性善恶虽没有明确的主张,但认为人性倾向于德,且具有仁义之性。孔子的性善倾向,为儒学以性善为主流的观点奠定了基础[2]。孟子明确主张性善论,认为人性是人的先验的道德性,人们生来就具有仁义礼智等道德情感和道德理性,肯定人具有善良的本质,能够以同情心(恻隐之心)去爱人。孟子人性善的价值判断,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了人本主义的立场和对人性原初平等的积极肯定,为建立和谐、仁爱的人际关系提供了内在的理论依据。孟子的恻隐之心与"不忍人之政"的仁政思想直接相联,成为推动社会救助活动开展的最深厚的道德心理。荀子明确主张性恶论,认为人性并非人的道德性,而是人的自然本性,"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的性恶论,为儒家封建道德教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孟、荀的人性善恶论在形式上截然对立,而在本质上却一致。孟子认为仁义礼智是人性的逻辑展开,荀子认为仁义礼智是教化改造的结果,通过"求放心"与"化性起伪"可实现儒家的人格理想,即"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奠定了历代儒家在人性问题上善恶双重设计的理论格局。宋代儒家学者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对孟子的性善论进行改造,在坚持性善论的前提下论述了人性具有双重性或二元性,即所谓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这样,性善论成为了儒家人性论的主导思想。

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儒家提出了以道德为人的根本的理想人格的追求和设计。儒家的理想人格首先具有现实性,所推崇的理想人格典范和代表人物都是历史上存在过的人,譬如尧舜禹。同时,成就理想人格的途径也切实可行。儒家的人格理想是入世进取、建功立业的,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把个人的完善与人类的福祉联系在一起,即所谓"博施于人而能济众"之人,也即儒家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值得一提的是,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的典范人物很多都是在社会救助方面有着突出贡献和作为的人:尧舜禹三大王在灾害救助方面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尤以大禹治水的故事特别为世人赞颂,流传数千年;武王好赈贫济弱;朱熹创办社仓,实施社仓赈贷,成为民间互助的重要贫困救助形式;范仲淹创立范氏义庄,成为宋代宗族救助的推动者,等等。作为君主皇帝,必须爱民利民,以救民于水火为己任。"圣人南面而立,以爱民利民为心。"(《吕氏春秋·精通》)"天下之民,穷矣苦矣。……凡王也者,穷苦之救也。"(《吕氏春秋·慎势》)由此可见,有社会救助事业方面的政绩,是古代帝王和圣人们追求的重要目标。

2.以"仁"、"德"为核心的人道主义——传统社会救助制度的基本价值理念

(1)"仁爱"——传统社会救助的道德情感之源

家庭是我国传统社会的伦理实体,也是传统社会的价值源头。西周时期,传统宗法等级伦理开始形成,"孝"、"德"成为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孝"规定的是奉养、恭敬和服从父母,是人道的原初体现。"孝"伦理是一种家庭代际伦理,既体现了父子血缘"亲亲"之情,也是父子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反映,在我国传统社会救助中发挥着最基础的道德功能。"孝"伦理后来经过儒家孔孟的继承和转换,发展为"仁学"、"仁政"思想。"仁"发源于"孝",又超越"孝",成为儒家思想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伦理原则。这样,"仁"、"德"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以"仁"、"德"为核心的人道主义演绎成推动传统社会救助制度的基本道德价值理念。

孔子创立了一个以"仁"为主、"仁""礼"结合的仁学伦理思想体系。孔子的"仁",是"人的发现",成为"人道"的本质,所谓"仁载者,人也"(《中庸》)。孟子有同样的认识,"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上》)。"仁是由人本身引申出来的行为原则,它要求人们以人为人,相亲相爱,反映了人对自身的觉醒,对人的类本质的理解,具有浓厚的人道精神。"[3]"仁"首先指"爱亲"之心。"子曰:立爱自亲始"(《礼记·祭义》)。"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孟子说:"亲亲,仁也"(《孟子·尽心上》)。"仁"的最深厚的根源即是家庭血缘的亲情之爱,人一出生首先处于父母兄弟的亲情之中,亲情之爱孕育了对他人的爱,离开了亲情之爱,仁者爱人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爱亲"的基础上,"仁"又被推及为"爱人",即"泛爱众"。孔子曰:"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泰伯》)。孟子则认为"仁"是人性中固有的一种内在情感——"恻隐之心"或曰"不忍人之心",也即人所固有的同情心,这种恻隐之心即"仁"之萌芽,也是仁爱的道德心理依据和主要内容,所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后代儒学思想家们继承和发扬了先秦儒家的"仁爱"思想,唐代韩愈提出"博爱之谓仁",北宋张载提出"民胞物与"的泛爱主义思想,即百姓是我的同胞,万物是我的同伴,甚至"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西铭》)。二程进一步提出"仁者公也",把"仁"和"公"、"公平"联系起来,"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个'公'字。……只为公,则物我兼照,故仁。"(《遗书》卷15)这样,"仁"的内容更加大众化,也易于为下层民众所理解。

"仁"由"爱亲"而推及"泛爱众"是一个重要的伦理升华,"仁"获得了更高层次的道德规定,体现了对宗族、社会乃至华夏民族整体利益的责任感和道德义务,构成了宗族救助和民间救助活动的伦理道德基础。仁者爱人体现出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在人己关系上表现出明显的利他、关注群体的价值取向,要求注重人的价值和尊严,重视人的生命,要求关心人、爱护人、帮助人,把他人的疾苦和幸福看作自己的疾苦和幸福,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与和谐的社会秩序。墨家主张"兼爱",对儒家"仁爱"原则形成补充。墨子认为:"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所以,墨子提出"兼以易别"、"视人若己",提倡"爱无差等",否定儒家"亲亲有术"的"爱人"原则。"兼士之言曰:'吾闻为高士于天下者,必为其友之身,若为其身;为其友之亲,若为其亲,然后可以为高士于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埋葬之"(《墨子·兼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爱下》)。墨子的兼爱思想反映了下层平民和小私有劳动者的愿望和要求, 一方面要求统治者保障基层百姓的生活, 另一方面倡导平民之间相互救助, 构成传统社会救助的伦理道德基础。

(2)仁政、德治、民本——传统社会救助制度的政治伦理基础

我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的社会, 儒家伦理由"仁"到"仁政"、由"德"到"德政"的理论路径, 反映出道德具有实践理性的性质。"仁爱"构成"仁政"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基础。孟子认为"仁"是为政的根本, 在"仁爱"的基础上, "仁"进一步上升为治国的政治伦理, 即由"爱人"推及"爱民", 由"仁爱"推及"仁政", 演绎出政治上的仁政思想。孟子提出以"不忍人之心(同情、怜悯心)行不忍人之政", "三代得天下也以仁, 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孟子·离娄上》)尊老爱幼, 恤矜寡, 抚孤独, 拯废疾等社会救助措施, 都建立在仁政的基础上。"德"是西周时期形成的另外一个重要道德范畴, "德"既指内在的德性与修养, 也是统治者的治国理念。"修德配命"、"敬德保民"思想的提出, 标志着"德治主义"在西周开始形成。"修德"、"敬德"对统治者就是要加强自身品德修养, 对老百姓就是要实行德政, 其主要内容是"惠民"。"惠民"的一个基本含义就是惠于庶民, "不敢侮鳏寡", 强调对无依无靠的鳏寡应爱护施恩。孔子继承殷周以来的"敬德保民"思想, 提出"德政"主张。孔子曰: "为政以德,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大学》指出: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仁政和德治都属于传统政治伦理的范畴, 有时可以通用, "德治"也称"德政", 两者都是指治理国家的理念和制度。仁政和德治为历代儒家所继承和发扬, 成为传统封建社会的核心政治伦理思想, 也构成传统社会救助制度的政治伦理基础。

"民本"与"仁"、"德", 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价值范畴。如果说"仁"、"德"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处理的是普遍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 那么民本思想则重点关注民与神(天)、民与君、民与国的伦理价值关系。"民本"首先是"人本", 是相对于"神本"提出来的, 所以在时间维度上, "民本"的价值理念要早于"仁"、"德"的价值理念。民本思想开始形成于商代, 西周以后, 社会人口的多寡已成为衡量统治者政策措施是否得当的重要标准和预测政治兴衰的重要指标。随着社会危机的全面爆发, 思想家们开始从形而上的高度对民与神、民与君、民与国的关系进行全面深刻的思考, 轻天重民、人主天辅的思想成为社会政治思想的主流, 传统政治伦理思想的发展开始由神本走向人本、民本, 由"神道"走向"人道"。"民本"的意思即"民惟邦本, 本固邦宁", 其根本目的是巩固封建统治, 即"重君", 但在客观现实层面上要求实施保民、惠民、利民、安民、恤民的各项政策措施。孔子要求统治者"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管子曰: "政之所兴, 在顺民心; 政之所废, 在逆民心。"(《管子·牧民》) 孟子"民贵君轻"和荀子"民水君舟"的思想都是民本思想的体现。西汉时期民本思想进一步发展, 董仲舒指出: "五帝三王之治天下, 不敢有君民之心, 什一而税, ……不夺民时, 使民不过岁三日, 民家给人足, 无怨望忿怒之患。"(《春秋繁露集注》)可见, 董仲舒已经把"重民"思想和社会救助的具体措施联系起来。在传统社会, 对灾民、鳏寡孤独人伦弱势群体的关爱、救助犹如一把尺子, 最能衡量君主、各级官员的爱民、保民思想和德性修养, 也最能赢得民心, 成为推动社会救助活动的最直接政治动力。

仁政、德治、民本的政治目标就是要实现"和谐"、"大同"的社会理想, 其中社会救助目标的实现是其重要内容。"和谐"的目标追求, 成为推动社会救助重要道德基础。儒家经典《礼记·礼运》描述了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和谐"社会图景: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 使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 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一"大同"社会图景, 生动地体现了社会救助的理想目标。

(3)忧患伦理精神——传统社会救助制度的责任伦理

忧患意识积淀于民族心理的深层, 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伦理精神和宝贵财富。"忧患可以区别为忧和患两种情态。前者侧重于对既成事实的愁怨哀伤, 后者则更多侧重于对未成事实的忧惧或焦虑。……前者是较感性的, 后者则较理性; 前者是消极的, 后者则是积极的。"[4]忧患意识既有对自然和天灾的忧患, 也有对社会不合理现实的忧患, 是一种对人们生存状况的理性反思。这种情感上升到伦理层面, 对普通百姓成为一种互帮互助、同舟共济、"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责任伦理。

在我国的文化典籍《易经》、《诗经》、《尚书》和《孟子》中, 都蕴涵着丰富的忧患意识。《周易·系辞下》最早提到: "《易》之兴也, 其于中古乎? 作《易》者, 其有忧患乎?"孟子从政治伦理的高度思考乐民忧民的问题: "乐民之乐者, 民亦乐其乐; 忧民之忧者, 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 忧以天下, 然而不王者, 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统治者只有时刻想着忧患, 解决人民的忧患, 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这要求统治者居安思危, 关心百姓的饥寒疾苦, 将忧患意识转化为实施社会救助的具体行动。楚国诗人屈原在《离骚》中对百姓的疾苦给予了深深的同情和忧患: "长太息以掩涕兮, 哀民生之多艰。"宋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 更是传统文化中忧患伦理精神的典型写照。忧国忧民、关心百姓疾苦的忧患意识, 成为推动社会救助的一种重要道德情感和责任伦理精神。在重大灾难和危机面前, 中华民族总是能够团结一致, 以空前的凝聚力战胜灾难, 2008年全国人民在汶川大地震中表现出来的抗震救灾精神, 正是这种传统忧患责任伦理精神的真实写照。

3.均平思想——传统社会救助制度的差等分配正义

我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血缘宗法等级社会, 以三纲五常构建了封建社会的基本伦理秩序, 人与人之间是一种差等的社会关系, 皇帝是天子, 所有的社会资源都由皇帝所垄断。经济不平等是封建社会的普遍现象, 社会救助必然要求财富再分配。在资源有限和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条件下, 普遍的贫困也是必然的。但是, 如果严重的贫富分化, 民不聊生, 必然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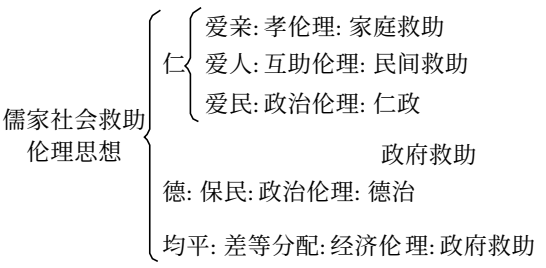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及社会的稳定和秩序,最终危及统治者的利益和地位。因此,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同样为封建统治者高度重视。先秦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都提出了均平思想,以均平的公平理念治理国家,实现理想的社会目标,同时传统社会的政治均平、经济均平和社会均平是紧密联系的,而政治上的"分"(等级秩序和均衡)构成均平思想的核心。《晏子春秋》最早明确提出"均贫富"概念,"其取财也,权有无,均贫富,不以养嗜欲。"(《晏子春秋·内篇问上》)韩非子也明确主张"均贫富"思想,"故明主之治国也,适其时事以致财物,论其税赋以均贫富,……此帝王之政也。"(《韩非子·六反》)儒家的孔子、孟子和荀子都提出了均平思想,其中孟子重视财富均平,讲求"制民之产",荀子讲求政治均平,提出"谨于分",孔子则把政治均平与经济均平结合起来,并进行了经典论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篇》)这就是孔子"均无贫"思想。这里的"均"并非平均,而是"分"的意思,即按照不同的身份和等级实施不同的分配,也就是合理分配的意思[5]。这种基于"均"的分配思想即是差等分配正义思想,即在均平的分配原则下,即使贫也能忍受,人与人之间也能相安和睦。"均无贫"思想的人性情感基础源于仁爱,儒家仁爱思想是普遍的,但是并不是无差别的,差等之爱推导出差等分配正义。

道家均平思想在价值取向上反对儒家的差等正义,但是在均平目标上却与儒家殊途同归。老子提出了"天之道"的平均主义思想:"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可见,老子倡导均平,主张亏损"有余"者以救助"不足"者,从而保障全体社会人员的基本生存权利。庄子以盗贼分赃论均平,既具讽刺而又显深刻,他认为平均财富是"仁"的表现,是一种宝贵的道德修养。道教经典《太平经》主张人们之间互助互爱和人人均等,反对恃强凌弱和等级特权,在财产分配方面提出"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也",并主张人人都应当得到生存的条件,富者应有"周穷救急"的思想,不可见死不救。同时,《太平经》还提出"智者当苞养愚者","力强者当养力弱者","后生者当养老者",要求智者、力强者和后生者承担扶弱救贫的义务。

财富分配的不合理是引起社会冲突和危机的重要原因,统治者必须采取措施调节各阶级、阶层间财富占有和分配的不平等,均平思想在传统农业社会和小农经济的历史条件下是有积极意义的。在自然条件恶劣、生产技术落后的农业经济形态中,合理比求富更切合实际,这是历代儒家学者坚持均平思想的缘故。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都体现了"均无贫"的伦理取向。这种均平政治、经济伦理取向,客观上推动了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事业的开展,构成了社会救助的重要伦理道德基础。

以下是儒家社会救助伦理思想的结构图:



(二)道家"无为"的政治伦理和"贵生"的生命伦理——传统社会救助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

从价值取向上来看,虽然儒家讲求入世,道家讲求避世,佛教讲求出世,但并没有因此否定道家和佛教不关注社会救助事业。相反,道家和佛教的伦理思想中蕴涵着深刻而又独特的社会救助理念,对以儒家为主体的社会救助伦理思想起到重要的补充和扩展的作用。道家除了"天之道"的平均主义思想以外,"无为"的政治伦理和"重生"的生命伦理是传统社会救助的重要伦理道德基础。

道家道德观的中心原则和政治伦理思想是"无为"。老子提出了统治者必须持守的政治伦理道德要求,即"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老子》)"慈"即"慈爱",是一种道德情感,居于"三宝"之首,蕴涵着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的人道精神。道家的"慈爱"与儒家的"仁爱"有不同的价值内涵,它体现的是一种不分亲疏的普遍平等之爱,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在政治伦理上,老子认为"道"法自然,政治也应该返本复初。道家提出了"无为"的政治治理理念,"无为而治"体现为君道无为和治国无为两个方面[6]。"治国无为"要求统治者自觉地服务于人民,维护人民的生存权益,推行休养生息政策以达到养民的目的,所谓"圣人爱养万民,不以仁恩,法天地之行自然"(《老子河上公章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道家"无为"的政治伦理思想显示其博大精深与超越性,一方面要求统治者不要恣意妄为,不随便干扰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所谓"治大国若烹小鲜",讲究勤俭节约、戒奢寡欲,不加重百姓负担。另一方面强调统治者爱民、养民是一种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并不期望民众的感恩戴德,所谓"不责望其报"。在封建时代,统治者的穷兵黩武、骄奢淫逸和繁重的苛捐杂税是导致百姓贫苦困顿、流离失所等生存危机的重要人为因素,因此统治者在政治上主张"无为"、与民休养生息,藏富于民本身就是一种救助。

道家、道教"贵生"的生命伦理为传统社会救助提供重要精神支柱。道家关注人的生存,追求洒脱、逍遥、圆融的生命境界,拓展了人的生命空间和精神视野,对社会生活中的芸芸众生是一种精神的解放和人性的舒展,对于提高生命价值和质量具有重要的精神救助意义。南怀瑾先生做了精辟的比喻:道家思想像药店,一旦人们生病,非自动找上门去不可,每到人们失去精神寄托的时候,每到社会衰乱的时候,道家就会受到欢迎。与儒家相比,道家十分重视人的生命价值,认为人生命的价值高于名利的价值,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就是为了使别人活得更好。因此,道家、道教主张济世救人,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扶危济困, 见义勇为, 救人性命于水火, 只有做善事, 建阴德, 在救助他人的生命中才能拯救自己的生命。汉代道教重要人物葛洪认为“积善”是养生的重要方法, 要求信奉金丹道教的人都要“积善立功, 慈心于物, 恕己及人, 仁逮昆虫, 乐人之吉, 愍人之苦, 周人之急, 救人之穷……”。可见, 道家、道教主张积德行善, 其目的不在于外在的功利和名利, 而在于获得内心的幸福和心灵的升华, 在心灵自由的境界中实现德福一致。

(三)慈悲精神——佛教宗教救助活动的伦理道德基础

以慈悲为本的佛教伦理精神, 构成了传统社会救助的伦理道德基础之一。佛教伦理精神广泛地渗入到我国传统社会人们的道德生活世界, 佛教的人生观认为人生就是苦难, 要通过修行才能脱离苦海获得拯救。佛教的善恶因果报应学说也是佛教伦理的重要构成, 认为人有六道生死轮回, 人的祸福果报, 是由人的“业”的染净、善恶决定的,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因此, 我国传统佛教讲求以慈悲为本、救苦救难, 普渡众生, 所谓“慈悲是佛道之根本”, “大慈大悲名为一切佛法之根本”。依梵文本义, 慈指友情, 悲, 指感叹, 感叹人生的苦恼而发悲愿。通常的说法: 慈指与乐, 给予快乐安稳; 悲指拔苦去除苦难。慈悲为佛法的根本, 也是佛德的根本, 因而是佛教伦理的根本。“布施”是佛教的基本修行准则和方法之一, “布施”包括“财施”和“法施”, 要求佛教信徒以自己的财物和佛道施于他人, 做到“掇己惠人”。

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 逐步实现其与儒家和道家(道教)思想的合流, 其救赎的思路也从依靠神异的“他力救赎”转向为依靠自身的宗教信仰和道德行为的“自力救赎”, “依赖于个人宗教信仰的人生解脱的思想, 在中国很快转变为一种依赖社会认同的‘道德救赎’思想。”[7]所以, 人在世时要“广种福田”, 要多做善事, 包括赈济、孝敬、忍辱负重等各种社会救助活动。可见, 佛教伦理以慈悲为精神, 通过“道德救赎”等具体社会行为, 实现出世与入世的结合, 在客观上推动了佛教组织和信徒在世俗生活中积极参与社会救助活动。

三　中国传统救助伦理思想的现代启示

(一)从传统“伦理救助模式”向现代“权利救助模式”的转变

当前, 我国正处在一个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救助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现代社会救助, 无论是作为一种救助思想还是作为一种社会救助制度, 都同传统社会救助(救济)有着紧密的关系。传统社会救助思想是现代社会救助思想的重要来源, 也为现代社会救助思想和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实践基础, 但二者之间在伦理价值观念上却有着本质的差异。现代社会救助制度是在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与现代人的生存状况紧密联系, 它涉及现代社会一系列深刻的政治和伦理道德问题, 是现代性的产物, 与现代社会权利平等伦理秩序相统一, 构成现代社会伦理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我国的当务之急是要建立起完善的现代社会救助制度, 实现从传统“伦理救助模式”向现代“权利救助模式”的转变, 实现全体国民的社会救助权利, 彰显社会分配正义。

在救助价值理念上, 由慈善恩惠的道义理念演变为公民权利的伦理价值理念, 社会救助权应成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建立社会救助制度的目的: 一要降低贫困, 二要减少社会不平等, 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配正义, 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果共享”的分配正义价值原则。在救助目的上, 从工具价值到本体价值的转变。社会救助制度的建立不仅是要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稳定, 减少社会对立和矛盾, 更本质的意义上是要维护人的尊严和自由平等。在救助对象上, 由特殊主义原则过渡到普遍主义原则。在救助内容上, 应由生活救助拓展到教育、医疗、住房等更宽广的领域。在救助方式上, 由带有歧视性的方式转变为政府的公共服务。“拿惠顾境况糟糕的人这一公共目的来说, 当他们仅是接受来自私人慷慨捐献的物质和金钱时, 他们会有一种羞耻感, 而且, 这种捐赠不是体系化的, 其作用也是相当有限的。但国家能采取有效措施来制度化地和成体系地缓解贫困, 而且这些受惠者从国家这一公共权威机构接受救济一般不会产生羞耻感, 因为这成了公民的权利。”[8]

(二)充分挖掘传统社会救助伦理思想的现代意义

传统“民本”思想在客观和工具价值的意义上, 强调爱民、保民、利民、惠民、恤民、安民, 这可以推动统治者关心百姓疾苦, 关注社会救助, 促进民生。“民本”思想在现代伦理秩序下可以转化为“人本”思想, 现代“人本”思想强调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 追求人的权利平等。在工具价值意义上, “人本”与“民本”是相通的。在现代社会救助制度的设计中可以充分借鉴传统“民本”思想中的爱民、保民、利民、惠民、恤民、安民等措施, 同时在现代伦理思想的价值指导下转换和拓展社会救助制度的内涵。此外, 道家“无为(不恣意妄为)”的政治伦理思想在限制国家和政府功能的意义上, 与诺齐克(Robert Nozick)的权利正义理论“最低限度的国家(minimal state)”的主张无疑具有某种相同的价值诉求。

孝伦理仍然是现代社会救助的重要伦理资源, 我国现代社会的家庭形式、功能已发生巨大变化, 核心家庭成为家庭的主要形式, 家庭不再具有经济功能。严格地说, 家庭不再是现代社会的细胞, 个体成为社会的细胞。传统社会严格意义上的家族基本上已经瓦解。但是, 家庭仍然是现代社会的伦理实体, 传统的家庭和亲戚伦理关系依然存在。家庭救助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救助形式, 但家庭救助是救助活动的最原初形式, 构成社会救助的重要前提和补充。家庭救助如果出现危机必然加重社会救助的负担, 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支撑家庭救助的价值基础是孝伦理, 孝伦理作为一种代际伦理, 是我国传统社会救助伦理思想的基础和源泉, 对老人救助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同时对教育救助、医疗救助和住房救助发挥重要补充作用。孝伦理仍然是现代社会救助的一种宝贵伦理资源, 对于社会的稳定、秩序与和谐发挥不可替代的功能。

生命伦理精神和忧患伦理精神同样可以发挥现代意义。传统道家生命伦理不仅追求一种超越圆融的人生智慧, 而且认为对人与人之间基于自然的本质上是平等的, 尊卑贵贱是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人为的因素造成的,这其中已经蕴涵了一种朴素的社会平等思想。道家强调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所以,道家主张人与人之间应相互尊重,平等对待,正确处理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并达至和谐与完善的境界。这与罗尔斯(John Rawls)的“差别原则(difference principle)”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偶然因素和社会偶然因素所采取的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妙。罗尔斯指出,个人在自然机遇和社会偶然因素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在道德上是不应得的。罗尔斯主张对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应该实行差别原则,实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以惠及最少受惠者。罗尔斯的理论成为现代福利国家的重要理论基础,也是对现代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的道德合理性证明。

(三)培育传统伦理精神与现代伦理精神相融合的救助文化

我国有着丰富的救助伦理道德资源,并形成了独特的救助文化传统。我国传统社会救助整体上是一种“伦理救助”模式,具有鲜明的道德色彩。传统社会救助伦理整体上是一种德性伦理,传统救助文化整体上是一种慈善文化。传统社会救助不仅在制度(技术)层面,而且在日常的救助活动中都强调个体的救助德性。儒家的“仁爱”、墨家的“兼爱”、道家的“慈爱”、佛教的“慈悲”以及孝伦理等,作为一种道德情感和道德美德积淀在民族心理的深层,是构建救助伦理的重要文化资源。现代社会救助制度主要是基于权利和分配正义的制度设计,它的建立既需要制度层面的实施,也离不开救助德性的培育。我们在构建现代社会救助制度的过程中要注重培育公民的救助德性,实现制度的规范性与公民个体德性的相得益彰,达至传统伦理精神与现代伦理精神的融合,从而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救助文化。

[参考文献]

[1] 王卫平,郭 强.社会救助学[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93.
[2] 唐凯麟,曹 刚.重释传统——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评估[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95.
[3] 唐凯麟,张怀承.成人与成圣——儒家伦理道德精粹[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99:168.
[4] 吴美卿.论《诗经》的忧患意识[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134-135.
[5] 李泽厚.论语今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253.
[6] 王泽应.自然与道德——道家伦理道德精粹[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99:134.
[7]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389.
[8] 詹世友.公义与公器——正义论视域中的公共伦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81.

The Main Meaning and Modern Enlightenment to the Ethical Thoughts of Traditional Assistance of China

ZOU Hai-gui, ZENG Chang-qiu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social assistance which has a long history is a style of "ethical assistance" as a whole and takes on a clear moral character. The Human Nature thoughts of doctrine of good human nature and the moral psychology of the awareness of unexpected development make up the moral basis of traditional social assistance. The humanism thoughts of "benevolence" and "morality", the political ethics of "people-oriented thoughts", and the subaltern distributive ethics of "average" make up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ethical thoughts of traditional social assistance. There are important supplements for the political ethics of "Inaction" and the bioethics "value of life" of Taoism, and the mercy of religious ethics.

Key words social assistance; ethical thoughts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